

试论近代西藏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1840～1960年）

王 川

（四川师范大学 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社会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610066）

摘 要：近代以来，回族、汉族、纳西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移民先后迁居昌都地区，成为该地区的历史移民。昌都地区移民与当地土著间的族际婚姻较之西藏其他地区多，这些非藏族移民的迁入，将各民族文化植入昌都，使之成为藏彝走廊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众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文化面貌显现复杂多样。

关键词：昌都地区；移民；族际交融；文化交流；藏彝走廊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6)05-0090-06*

昌都地区为现今西藏自治区的七大地区（山南、那曲、日喀则、林芝、阿里及拉萨市）之一，是康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富有民族交融、文化内涵丰富的特点。其中移民史是包括昌都在内的整个康藏地区社会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页。民国时期（1919～1949年）已有学者关注康藏外来移民的研究。当时，拥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多批学者进入康藏地区进行人类学、社会学等调查，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的论文，其中包括关于康藏地区外来移民问题的调查与研究。1931年8月，张六师《西康移民问题》一文[1]，对西康的移民情况进行了介绍。1933年起，任乃强发表了《西康图经》的“境域”、“民俗”、“地文”诸篇，对西康的“汉族与其他各族”予以了记

述，其中包括移民问题等，该文是有关康藏地区移民的比较详细的、全面的调查研究论文，对了解民国时期康藏地区移民的情况很有参考价值。随后，其他学者也开始研究康藏地区的移民等问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近代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情况作一论述。

一、清代以来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

昌都地区是康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昌都在清代史籍中又被写作“察木多”等，英文音译一般作 Chamdo，也有作 Chiamdo、Chabmdo，法文音译为 Chamiton [2]（P148, P189, P282），均系藏语对该城称谓的音译。现今昌都地区包括了昌都、江达、贡觉、类乌齐、丁青、

收稿日期：2006-05-12

作者简介：王川（1969-），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驻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任乃强先生在1929年西康考察札记基础上撰成该文，最初从1933年起连载于《新亚细亚》，1937年7月由新亚细亚学会汇集成书出版。其中，在“客民来历”中，任乃强先生记载了“居留西康之汉人”、“陕人入康小史”、“军台与移民”、“垦民小史”等；在“客民小传”中，记载了康区比较有名的一些外来移民；在“移民问题”中，任乃强先生讨论了“移民与国防”、“移民与内乱”、“移民与开发实业”、“移民之稳健办法”、“客民生活之容易”、“赴康者宜具之艺能”。该文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重视，被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区之先河”。

参见大可《西康回民》（《月华》14卷5、6期，1942年6月）、马长寿《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其社会组织》（《民族学研究集刊》5期，1946年4月）、吴文晖、朱鑑华《西康人口问题》（《边政公论》3卷1、2期，1944年1、2月）等文。

察雅、左贡、八宿、芒康、洛隆、边坝等 11 个县。

就西藏自治区而言，藏族与门巴族、珞巴族是世居民族，此外历史上有其他民族移居；即以拉萨而言，也非纯粹藏族聚居之地，各地移民长期存在。20 世纪上半叶数次造访拉萨的殖民主义者贝尔（C. Bell）亦承认拉萨“不纯粹是一个西藏人的城市。这里有从西伯利亚边境和西伯利亚本土来的蒙古人，从中国很多省份来的中国人，来自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的人，来自中国土耳其斯坦（新疆）的人以及来自西藏边远地区的西藏人。这种情况，在锡金或大吉岭是很难见到的”[3]（P242）。“在锡金或大吉岭是很难见到的”多民族移民旅居情况，在清代以来昌都地区社会发展史上却常见。在昌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多民族移民先后迁居，这些非藏族人口符合中国移民史研究通常意义所说的“移民”应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留了一定时间的移动人口”的定义[4]，可以称之为在昌都地区的历史移民，如回族、汉族、纳西族、维吾尔族等。下分述之。

1. 回、纳西族移民昌都

回族移民最迟在明清之际就迁入西藏地区，大多来自甘、陕、青、滇省，起初多为商业人口。至 1918 年共有 55 户，定居昌都的回族也曾建立了自己的联谊组织，如“陕西回馆”，并形成了一定势力，甚至曾垄断了昌都城的牛羊屠宰及零售；昌都解放（1950 年）时，定居昌都的回族仍有 50 多户，他们为了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具体表现在出任“通事”（翻译）、护理受伤士兵、磨炒青稞等；此后又有一些回族的迁入。从 1957 年 1 月起，数月之内从青、川各地流入昌都的回族就达 40 多人，当年甚至有昌都回族马东海、张文福入京。回族聚居的“大分散、小集中”特点也体现在昌都，围绕着清真寺的地带成为回族的居住区——色仓生、达然通，即今昌都东幸福街和聚盛街东。由于回族是一个善于流动的民族，这与他们善于经商有关，这一特征目前仍体现于在昌都的回族社区，如昌都县城关镇齐齿（丁）街平时回族流动人口在 100 人左右，但是一到虫草收购季节，这个数字

就会上升到 200 人，甚至 300 多人。一般认为，纳西族在明代迁入昌都。此前纳西文化已传入昌都地区，昌都地区的建筑、艺术均有纳西文化的因素存在，如始建于公元 1164 年的噶玛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祖寺）大殿的建筑风格，就是藏、纳西、汉三式合璧；至今昌都盐井、芒康等地藏、纳西族流传的“木（穆）天王”的民间故事，就是古代云南丽江纳西木土司史事的民间版本；至 1954 年时盐井宗（现属芒康县）“摩西族人有 62 户”；现今西藏唯一的纳西民族乡就在上盐井村。

2. 汉族移民昌都

汉族移民在较早时间迁入昌都地区，较大规模的迁入在清代中期。随着清朝多次用兵西藏及在交通线设置台站，以及粮务、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员的设立，大量军队驻扎于昌都。部分官兵退役后，就逐步在当地定居下来，并与当地藏族通婚育有子女。时间一久，许多驻兵在驻地附近开垦荒地或做些小生意，并逐步定居下来，成为汉族移民。对此，民国时期昌都总管府汉文秘书王廷选（任芝）在所撰的《昌都历史述》中归纳得十分精辟：清代驻扎的士兵初为川、滇两省分选，“因川滇制兵时起冲突”，驻防昌都之兵全由四川抽调，“每三年调换一次，以均劳逸之计。后乃制兵渐有家室牵盘，每届调换，退除名粮，即为土著。久之三年一换之例，化为乌有。现今之昌都八十余家汉人，皆为前清制营之遗种也”，现今昌都的汉族亦大多与此及与 1950 年进藏的解放军十八军将士有关。

随着军人的戍守，陕西等地汉商亦随后迁入，如文献记载当时昌都有“汉人贸易者数十家”[5]；“蜀商滇客，辐辏而至”[6]；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驻藏大臣联豫上书，称昌都系“川、滇商旅会集之所”，“详查察木多、拉里、前后藏等处汉民日渐加增”[7]（P15）。内地陆续来到昌都的汉商，时间一久，就在当地定居下来。除了从事商业贸易之外，还有少数人在当地经营农业和畜牧业。这些汉族移民的原籍以陕西为最多，四川次之，诚如 1941 年李亦人《西康综览》所指出的：“‘豆腐老陕狗，走尽天

1997 年 7 月 31 日，笔者在昌都县城关镇齐齿 [丁] 街调查时，街道主任向巴提供这一数字。

参见昌都地区档案馆所藏档案，《盐井宗社调材料》，1954 年 5 月 25 日。

参见西藏昌都地区档案馆藏王廷选《昌都历史述》（手稿），1938 年 9 月 5 日撰述。

下有’，此川、康间流行之俗谣也。今日西康汉商陕人多于川人数倍”[8] (P345 - 346)。1952年川藏公路通车后，四川人逐渐成为最多，陕西人次之，这一状况持续至今。

汉族不断迁入昌都各地戍边、经商、务农，由于语言、习俗等的差异，初到一个异地的移民群体与土著及内地不同省份的移民间存在较大的隔阂，使得各省和各地区的移民内部需要有一种内聚的集体组织，互相帮助关照，防止由于身居异乡而可能受到的歧视和排斥，而对乡土的眷念和共同的本土民间信仰的因素，使这种组织以会馆及其相应的庙会活动出现，并定期召开行业庙会，联络感情[9] (P109)。

3. 维吾尔族移民昌都

在迁入昌都的非藏族中，维吾尔族到来的时间最晚，人数最少，影响最小，以致鲜为人知。昌都解放（1950年）后，根据“关于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中共西藏昌都分工委对当时昌都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相应进行了缩减，动员了部分来藏参加建设工作的汉、回、维吾尔族工人及商人离开昌都地区；此后不久上述部分人员回流，以至于中共西藏昌都分工委、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于1958年6月3日联合发布了《关于限制金沙江以东汉、回、维吾尔等族居民流入昌都地区的规定》，上述记载说明了当时维吾尔族在昌都的某些状况，至今昌都亦有维吾尔族。

二、昌都地区外来移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以昌都镇为例

1. 城区人口总数的变化及移民占人口的比例

昌都城区人口总数，在清、民国以来的汉文史料中均有记载。晚清傅嵩焘《西康建省记》说：“察木多险则险矣，而可为城邑之地，过于狭隘，仅可容八十户，仍须运购粮食”。[10] (P122)稍后的资料说昌都有“居民六七百户，大小喇嘛寺甚多。汉人居此者亦不少。设有军粮府治理之”[11] (P16)，此处所言汉人，当包括了回、纳西等数移民，以下所引史料大致类如。

1930年，翁之藏估计昌都城有“居民二千

余人”；次年春，名僧法尊至昌都，说昌都“为康地交通之中枢”，“闻昔日昌都之繁盛，较打箭炉有过无不及”[12] (P12 - 13)。1939年，路过昌都的汉僧邢肃芝（法号碧松、藏名洛桑珍珠）估计“昌都此时有居民约六百多户，川、滇、陕三省的汉商，有许多在此地经商”[13] (P114)；1946年，任乃强在论文中说：“昌都汉人颇多”[14] (P12)。

1948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认为“西藏全境所有汉人之目数尚无法确实调查”，但估计在拉萨有汉人2000人，昌都约为百人[15] (P30)。

1950年，昌都解放时城区人口为500户，2000余人，当地藏话称为“莫堆阿加”——500户。其中汉人80余户，有“徐家十八家”之谓，可见徐姓是昌都汉人的大姓，此外还有王、李、张、包、铁、马、彭、毕、刘、董、蔡、程、罗……等[16] (P47)。解放之初旅居昌都的汉回族名流有王廷选（任芝）、李子芳、蔡嘉溶、铁宝兴、王永兴、宋乍巴等人。从1952年川藏公路通车后，昌都城的人口增多了起来，汉族亦随之有所增加。可见，在本文论述的近代时期，昌都地区的主要居民为世居的藏族，移民以汉回族为主。

2. 昌都城移民的职业

早在1846左右，到达昌都的法国传教士就记载说，昌都生产的粮食“远不足以使当地居民食用”，“现在，察木多的贸易已达到了年8万英镑，主要是用鹿茸、麝香、黄金和白银来交换丝绸、棉纺织品和家庭日用品”[17] (P641, P683)。当时经营商业的汉族移民不少，如晚清宣统年间（1909~1911年）昌都城中“陕西商铺十数，无货卖，常四乡以茶、茸、麝、狃狸、狐皮交易”[18] (P406)。

在近代昌都，移民从事职业除商业外主要还有小手工业，包括磨面、裁缝、做牛油蜡烛、酿醋等。据1951年1月中共西藏昌都分工委的《昌都地区情况调查》，当时昌都各业的情况是：

大小商店45家（行商摊贩等不在内），其中资本最大者为松松、谢娃拉之父拉汪、李子芳、柴洛、纪索、朱古仓、亚仓等。裁缝20多家，仅有脚踏机2架，

参见西藏昌都地区档案馆藏王廷选《昌都历史述》(手稿)，1938年9月5日撰述。

手摇机 1架,余为手工。银匠 3家(察雅银匠在此落户的不算),木匠 9家,铁匠 4家,石匠 4家,种菜园者 7家,磨房 7家,作蜡烛者 2家,烧酒的 7家,屠户 7家,缝毛皮的 2家,做豆腐的 1家,作豆麦面粉的 1家,酒馆(即妓院) 30余家,漆匠 1家,皮匠 32家,开鸦片馆 1家,其余还有其他职业。[19]

城郊还有汉族移民开辟的农田,尤其是种植蔬菜的园圃:本县“产菜蔬,因此汉人居多临城附近辟地为圃,数十家瓜棚豆架,形同内地”[20](P6)。这一园圃的位置大约是在现在是昌都百货公司一带。

3. 社区组织与墓地

旅居昌都汉人、回族在 1950年前后约有数百户,此前他们建立了数个“会馆”,以此作为同乡、行业会馆或联谊组织。这些汉、回族组织大多成立于民国七年(1918年)“民七事件”后。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孝义会”,系定居昌都的汉回移民共同建立的组织,当地藏话称“孝义会”为“甲西法”,意为“汉族的团体”[21]。这一清代已成立的昌都驻兵组织,在 1918年民国七年(1918年)“民七事件”后重新改组,当时有会员 90多家,数百人之众。由于有昌都强巴林寺第二大呼图克图谢瓦拉之父为后台,该会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1950年前后该会仍有 80多家会员,其中回族 16户。该会设有会长 1人,以有文化、有口才、德高望重者担任;副会长 1人,会首 6人,其工作是管理会内一切事务,如放债、派汉民支差。当时会长为王永兴,副会长为斐文秀,会首为毕永胜、毕永兴、蔡相尧、胡林、王人之、徐久林等 6人。“孝义会”敬奉的神灵为比干丞相,每年两次游街赛神。

此外,还有“三圣会”、“葬会”、“至义会”等 10余个组织,这些组织或以行业为名(如“孙膑会”,会员全为皮匠,1945年曾分为“大孙膑会”、“小孙膑会”,解放之初分别有会员 13、9人),或以地域为名(如“陕西回会馆”),或以年龄段为名(如“青年会”,1947年成立,解放之初有会员 13人),或以性别为名(如“妇女会”)。这些组织

基本以汉族为主,如“三圣会”(1918年成立)、“葬会(直属于“孝义会”,负责汉回移民的丧事处理)、“仁和会”(商人组织,解放之初有会员 9人)、“至义会”(1918年前成立)等。

在昌都城外有回族墓园、汉人墓地。回族“归真”(“归于真主阙下”的简称,意即去世)后则土葬于回族墓园,初在昌都城北郊杂空地方,“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一定破坏。该墓园由昌都清真寺及回族人管理,至今仍在用。汉人死后全部皆以棺材在墓地中土葬,如“民七”事件后,“昌都附近汉人之坟墓,尽被发掘,战争之祸,殃及枯骨”[21](P39);在昌都镇东南面扎曲河西畔的达拉通卡(现名聚盛街)菜地里,原有大小墓地两块,大者约 250平方米,小者约 150平方米,墓主系民国时期昌都总管府汉文秘书王廷选(任芝)家族,王家为近代入藏的陕西汉人,遂婚于当地,王氏墓地原有几十个墓葬,立有汉文墓碑,“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此外,在现今昌都地区洛隆县硕督镇南约 200米的觉贡登台地上有一片汉人墓区。墓地东西长约 150米,南北宽约 80米,占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现有墓葬 169座。不少坟丘及墓碑已不复存在,残存有石块垒成的坟丘,个别墓葬前还立有墓碑,墓丘后方还以石块砌成半圆形的空域,在 169座墓葬中共发现墓碑 39块,碑文均为右起竖写,写明墓主的官职、籍贯,从碑文内容看,死者均为清光绪宣统年间至民国三十年间去世于当地的汉族,绝大部分系清末民初军人。

4. 汉回移民的坛庙及清真寺

明清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官员的出入藏区,尤其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中央政府所任命文武官员的入驻,藏区各地城市逐渐建立了台站、县衙、哨所等,而相关的庙宇也先后被建立起来。如清代昌都江卡(今芒康县)南墩的“汉人寺”,昌都“汉人建立”的“普安堂”等[23],晚清时仍存的文昌宫、观音阁、关帝庙、城隍庙、龙王庙等[24](P268, P274, P299-314)。清代昌都地区历史上存在的民间宗教——丹达神崇拜、瓦合神崇拜,不仅在昌都地区而且在川藏沿线以及拉萨、成都等地均有流

此承西藏昌都地区土呷先生告,四川大学考古系李永宪教授称正式的科学发掘报告即将发表。在此,谨向两位先生表示感谢。

传，至今仍在昌都地区有一定影响。这两种崇拜的原型为清代康熙、乾隆时代的进藏官兵，至今尚存的清代碑文《丹达山神记》、《瓦合山神记》就是这两种民间崇拜的证据 [25]。

根据民国初年的记录，当时昌都县“汉人寺庙有观音阁、龙王庙、土地祠、万寿宫等，悉在本城，有寺无僧” [26] (P7)，可见当时昌都存在多种汉人坛庙。观音阁又称“观音庙”，民国时期昌都有汉族血缘的妇女每年均在此修行半个月，其中 7 天禁食；龙王庙又称“龙王堂”，设有庙宇之类的建筑物，以及设于两河相汇处的祭坛“宗那措”，每年初夏时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之后进行泼水祈福活动；土地祠又称“土地庙”，祭祀土（地）神之所，古称土地之神为社神，后世称为土地，内地各县均有土地祠，有的县还不止一处，稍发达的乡镇也设有，昌都的土地祠是当地“诸汉庙中最大最有名望者”，也是藏汉人民抽签打卦的地方，举行的诸种祭祀活动也“最为生动”，这种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到了 1958 年才停止。此外，近代的昌都城内有川主庙（主要供奉蜀汉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灵官庙（灵官即仙官，灵官庙不详其所供何神及功能）、丹达庙（本来供奉关帝，后来供奉丹达神，故也被称为“关帝庙”，当地藏族人则认为供奉的是格萨尔） [16] (P51 - 54)。

民主改革，前昌都县城的汉人的坛庙只保留下来了 5 座：川主庙、观音庙、灵官庙、土地祠、城隍庙。此后 5 座坛庙纷纷拆掉另建教育等用途建筑，如 1951 年在当时昌都城西北角的一座城隍庙（一说观音庙）内建立了昌都地区第一所小学——昌都小学。1997 年 7~9 月在昌都调查时，地区文化局图嘎先生曾导笔者在昌都旧城区中一一指明了“城隍庙”（现为县公安局）、“关帝庙”（现为地区公路养护段）、“土地庙”（幸福街 60 号）、某“汉庙”（“水神庙”或是“天神庙”，卧龙街 19 号）等庙坛的旧址，上述庙坛毁于“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无一存留者。

回族将伊斯兰教传入昌都，并在昌都修建了大型的清真寺，至今尚存。关于清真寺的始建年代，或云在清康熙 41 年（1701 年），比较肯定的是咸丰年间（1851~1861 年）已建立。“文化大革命”期间，昌都清真寺遭到了破坏，20 世纪 90 年代进行过几次维修，著名的伊斯兰清真

寺、甘肃临潭西道堂还派人送来了“宏扬真教”的贺匾，并请来阿訇马忠义主持教务，现任阿訇（教长）为杨纯灵 [28]。

三、昌都地区移民与当地土著的互相影响

1. 昌都地区移民与当地土著间的族际婚姻较之西藏其他地区多

昌都地区的民族杂居情况，与西藏其他地区相比更为普遍，这使得在西藏地区昌都一地的民族杂居、族际婚姻最为普遍，昌都文化面貌因而更加丰富多彩。如当地纳西族与藏、汉族的通婚，结果是大部分纳西族接受了藏文化，一部分纳西族接受了汉文化，外在表现之一便是接受了藏文化的纳西族改宗藏传佛教，除服饰外与当地藏族居民无甚差异；而接受了汉文化的纳西族则在春节贴春联、放鞭炮、互相拜年，平常吃炒菜、面条等。

回族与藏、汉族通婚在昌都也不少见，昌都信仰伊斯兰教的主要是回族，以及小部分回族人娶藏族女子为妻，婚后的藏族女子一般从原来信仰藏传佛教改宗伊斯兰教。

昌都的汉藏通婚更为常见，如 1960 年边坝宗（今属洛隆县）上层头人博登顿，其祖父李昌就是清末赵尔丰部下一军官，滞藏后与当地藏族女子结合而有了后代。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现今昌都属于这种情况的居民仍占一定比例。族际婚姻对于沟通民族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他们使得昌都文化面貌更加丰富多彩。

2. 外来移民文化与昌都本地文化的互相影响

昌都近代以来民族迁徙频繁，这些非藏族移民的迁入，将非藏族文化植入昌都。

汉族迁入后对当地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如音乐、舞蹈均有明清文化影响的痕迹，如舞蹈的动作、绣有“清”、“兵”汉字的舞衣等；事实上，汉族入昌都前藏汉文化的交流已在昌都产生了影响，如建于吐蕃时期贡觉的通夏寺就是藏、汉、印度三式合璧的建筑风格；建于公元 1164 年的噶玛寺的大殿，就是藏、纳西、汉三式合璧的建筑风格；建于公元 1320 年的类乌齐查杰玛大殿的建筑风格，就是藏、汉、尼泊尔三式合璧；现今昌都唐卡画的三大画派之一的“噶学噶志”画派，是西藏唐卡画的重要流派，该画

派吸收了明朝永乐年间的风景画法及作色方法，深受汉文化影响；汉人的组织也影响了昌都的藏族妇女，昌都县城关镇的民间结拜组织，藏话叫“结拜”，源于汉语。这一藏族妇女的组织的功能在于给妇女姐妹之间提供了互相帮助、互相倾诉的场所。这种情况在全国藏区中仅有甘孜、迪庆等少数地区可与昌都相提并论，而在西藏各地区中则是绝无仅有的。回族移民的迁入，不仅将回族风俗习惯带到昌都，而且将伊斯兰教传入昌都，并成功地使少数藏民族改宗伊斯兰教。

昌都本地藏文化也对移民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汉、回移民中的一些人使用藏名，如昌都清真寺现任阿訇为杨纯灵藏名洛桑。至于生活藏化的汉回移民则更多，在民国邢肃芝等人的记载中随处可见 [13] (P127 - 128)。

由于古代以来外来移民的影响，使得昌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共融交汇之地，在民族面貌上表现为族际婚姻广泛带来的混血性，使得这一区域文化面貌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多民族、多宗教、各文化和平共存的“香格里拉”式景象。

四、结 语

法国石泰安 (R. Stein) 在《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一书中论述了川、藏、滇、青、甘交汇地带的众多古代部族，认为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活动的舞台，民族迁徙频繁；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 [29]。昌都地区正是藏彝走廊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这里是众多民族活动的舞台，民族迁徙十分频繁，相互联系密切，也是藏、彝、纳西、怒、珞巴、门巴等数十个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因而这里成为古代以来民族、部落会聚之处，文化面貌自然复杂多样。作为藏彝走廊的核心组成部分及“西藏东部交通的枢纽” [30] (P118)，昌都地区还是所谓“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麝香之路”的必经之地，种种“道”、“路”成为条条“纽带”，为不同民族频繁往来提供了便利通道，结果不仅带来双方移民的频繁互动，而且丰富了昌都地区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 张六师. 西康的移民问题 [J]. 新亚细亚, 1931, (6).

- [2] 美 皮德罗·卡拉斯科 (P. Carrasco). 西藏的土地与政体 [M]. 陈永国译. 拉萨: 西藏社科院编印, 1985; Parshotam Mehra. *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m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 Tibet and China*. [C]. vol. 2 (1914—5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法 古伯察 (R-E. Huc). 鞑靼西藏旅行记 [M]. 耿升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 [3] 英 贝尔 (C. Bell).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 [M]. 冯其友, 何盛秋等译. 拉萨: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编印, 1985.
- [4] 葛剑雄. 中国移民史 发凡 [J]. 历史地理, 1990, (9).
- [5] 魏 源. 圣武记: 卷 5, 外藩 [M].
- [6] 黄沛翹. 西艺文考 [A]. 西藏图考: 卷 8 [M].
- [7] 吴丰培. 联豫驻藏奏稿: 卷 3, 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折 [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79.
- [8] 李亦人. 西康综览 [M]. 左永泽等校订. 台湾: 正中书局, 1941.
- [9] 来作中. 解放前康区商业简述 [A]. 甘孜州文史资料 (第 7 辑) [C]. 1988.
- [10] 贺觉非. 西康纪事诗本事注 (林超校本) [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
- [11] 陈渠珍. 艸野尘梦 [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9.
- [12] 法 尊. 现代西藏 [M]. 汉藏教理院, 1937.
- [13] 邢肃芝 (口述). 雪域求法记: 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 [M]. 张健飞等笔述.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2003.
- [14] 任乃强. 西藏自治与康藏划界 [J]. 边政公论 (第 5 卷), 1946, (2).
- [15] 蒙藏委员会. 边政简政: 第 5 卷. 边疆通讯合刊, 1948, (2, 3).
- [16] 马丽华. 藏东红山脉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17] 古伯察. 鞑靼西藏旅行记 [M]. 耿 升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 [18] 傅崇矩. 成都通览 (下)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7.
- [19] 仁科. 昌都地区情况调查 [M]. 西藏昌都地区档案馆藏, 1951-01-23.
- [20] 刘赞廷. 昌都县志略 [M]. 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 第三集 [Z].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1.
- [21] 土 呷. 鲜为人知的昌都旧时帮会——孝义会 [J]. 中国西藏, 2003, (1).
- [22] 杨仲华. 西康纪要: 上册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 [23] 黄沛翹. 西藏寺庙考 [A]. 西藏图考: 卷 5 [M].
- [24] 有 泰, 吴丰培. 有泰驻藏日记 [Z].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2.

(下转第 134 页)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a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SUN Hong-s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tea production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ea production became a new and quickly developing industry which exerted a far-reaching socio-economic influence. Tea industry in this period not only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strengthened its position but also quickened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forms of the social system.

Key word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ea economy; social change

~~~~~  
(上接第 95页)

[25] 王川. 清及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丹达神崇拜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3, (1)

[26] 刘赞廷. 昌都县志略 [M]. 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 第

三集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1.

[27] 杨纯灵 (洛桑). 西藏昌都的清真寺与穆斯林 [J]. 中

国穆斯林, 1996, (3)

[28] 法 石泰安 (R. Stein). 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

[M]. 耿升译.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 费孝

通. 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 [J]. 中国社会科学,

1980, (1).

290] 德 伯戴克. 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 [M]. 周

秋有译.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何斯强)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Migrants in Changdu Prefecture of Tibet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s

WANG Chuan

(Research Center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modern times, some members of the Hui, the Han, the Naxi, the Uygur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had migrated to Changdu Prefecture of Tibet of China. There was more intermarriage between these ethnic groups and the locals in Changdu than in other areas of Tibet. These non-Tibetan migrants brought their own cultures to Changdu which became the core part of the Tibetan-Yi Corridor, a stage for numerous ethnic groups, a bridge and center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us, Changdu reveals a diversity of ethnic cultures.

**Key words:** Changdu Prefecture; migrant; fusion between ethnic groups; cultural exchange; Tibetan-Yi Corridor